

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研究在中国

宋虎堂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在整体总论、基本问题探究、学科互涉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还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学理论,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形象学; 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2-0103-04

形象学产生于19世纪,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象学进入中国并逐步发展起来。在北京大学孟华等学者的倡导下,我国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纷纷著文论述,在形象学整体总论、基本问题探究、学科互涉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一 整体总论

在译介国外形象学理论的同时,一些学者撰文从宏观上论述了形象学的发展走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孟华的论文最具代表性,她的《形象学研究要注意总体性与综合性》一文,指出了当代形象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走向。认为:“形象学研究应在处理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中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在这方面,中国‘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或可提供某种哲学的帮助。此外,形象学的跨学科性也要求注重研究的总体性与综合性。”^[1]为了更好地把握形象学的内在逻辑,孟华建议引入“形象场”的概念,以帮助研究者建立总体、综合的意识,倡导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树立“小心态”,即“一种求真的精神、一种严谨扎实的学风、一种开放的意识。”^[1]注重对形象学进行总体和综合的研究是形象学研究的一大进步,但形象学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研究者如何在多学科的交叉点处理这种复杂关系,能否准确把握研究尺度与方向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周宁、宋炳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一文认为形象学研究涉及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领域,在

比较文学视野内,异国形象的研究领域显得过宽,在比较文化视野内,异国形象的研究领域又显得过窄。作者敏锐地看到了形象学在研究领域边界上存在的问题,但没有找到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陆友平的《全球化背景下形象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走向》一文尝试用现代理论对欧洲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用对话原则来思考形象学的现代转向模式,使形象学研究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化局面,旨在建立新的合理的文化交流秩序,为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对话提供前提条件。

尹德翔在《关于形象学实践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并深入分析了几组值得探讨的问题:“形象与非形象、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真与假、模式化与非模式化。”^[2]这些问题已初步涉及到形象学本土化的问题。在《比较文学形象学本土化二题》一文中,认为要实现形象学的本土化,就“必须经过某种调适以加强其有效性,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把握它的一般性特点和特殊形态,换句话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必须具有中国文化眼光。”^[3]赵颖在《略论当下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四组争议》一文中指出了形象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争议:“形象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的不同论调;形象学是应该坚持‘文学性’走向还是延续‘文化研究’的偏颇;关于研究视野中对于‘东方’还是‘西方’模式化解读;形象学视野下‘形象’是否真实以及什么是真实形象的争议。”^[4]这些争议是西方形象学理论移植后的必然反应,对于形象学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蔡骏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与文学变异》

一文运用文学变异学理论,合理地揭示了形象在塑造、传递等过程中发生的多重变异现象,但未能具体论述形象在塑造、翻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变异是如何发生的。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 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

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5]154}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6]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5]191}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

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7]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8]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9]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 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代发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等后现代理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10]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1]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代理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12]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

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13]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14]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 [1] 孟 华. 形象学研究要注意总体性与综合性[J]. 中国比较文学, 2000(4): 1-19.
- [2] 尹德翔. 关于形象学实践的几个问题[J]. 文艺评论, 2005(6): 9-13.
- [3] 尹德翔. 比较文学形象学本土化二题[J]. 求索, 2009(3): 183-185.
- [4] 赵 颖. 略论当下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四组争议[J]. 世界文学评论, 2011(2): 265-268.
- [5] 孟 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54, 191.
- [6] 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35.
- [7] 杨 叶.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J].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6): 54-57.
- [8] 陈 惇, 谢天振, 孙景尧. 比较文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167.
- [9] 王向远.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236.
- [10] 陈 惇, 刘象愚. 比较文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22.
- [11] 高旭东. 比较文学实用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85.
- [12] 刘洪涛. 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9(3): 69-73.
- [13] 张晓芸. 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2.
- [14] 李 红, 张景华. 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12(2): 77-79.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agology in China

SONG Hu-t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for domestic imagology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re are some preliminary fruit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ut it lacks its own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We should construct our own imagolog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accepting and absorbing other discipline theori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oday's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agology; theoretical research